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2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

超文本文学形态探析

中国文学理论近现代转型的特征分析

中外戏剧交融中的探索与创新
——新时期“探索戏剧”的反思与批判

鲁迅与赖和启蒙思想比较论
——以两人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

Space Prod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The Analysis of Types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Find a New Way in the Merg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Exploratory Drama” in the New Era

A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and Lai He about their Enlightenment Thought:
—Focusing on their Local Novels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Reconsidered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2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丛刊. 第 12 卷. 第 1 期 / 周勋初, 杨义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305 - 06588 - 0

I . 文… II . ①周… ②杨… III . 文学评论—中国—丛刊
IV . I206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383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书名 文学评论丛刊(第 12 卷第 1 期)
主编 周勋初 杨义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63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368 千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588 - 0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mailto: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评论丛刊》编委会

主 编 周勋初 杨 义

副主编 赵宪章 王保生 丁 帆 徐兴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保生 王彬彬 左 健

张宏生 杨 义 杨正润 周 宪

周勋初 金鑫荣 赵宪章 胡星亮

莫砺锋 钱林森 徐兴无 董 健

执行编委 徐兴无

目 录

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	谢 纳(1)	
从语言到话语:语境研究的兴起	吴 昊(8)	
超文本文学形态探析	韩模永(15)	
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现代焦虑体验	史修永(22)	
齐梁“风骨论”生成的文化因缘及其美学内涵	范立红(31)	
“水中月”的佛学渊源与艺术生成	张 勇(40)	
中国文学理论近现代转型的特征分析	刘再华(50)	
文学、文学理论的文化立场问题.....	屹 宇(61)	
中外戏剧交融中的探索与创新		
——新时期“探索戏剧”的反思与批判	胡星亮(67)	
论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个性特征	周水涛(77)	
鲁迅与赖和启蒙思想比较论		
——以两人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陈家洋(85)	
论闻一多的诗中之学	刘殿祥(94)	
“口语”的革命		
——略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杨 慧(103)	
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	李城希(112)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多重维度	刘学明(120)	
浪漫英雄传奇的中兴与末路.....	孙晓燕(129)	
略论汪曾祺 8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潘文峰(135)	
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		
——有感于《王蒙自传》.....	董之林(142)	
赞体起源考.....		余 琳(149)
格律诗形成新探.....	龚祖培(156)	
唐中宗与初唐宫廷诗的新变.....	鲁华峰(164)	

“看文字法”的《古文关键》

- 《古文关键》所体现的文学观念..... 叶文举(175)
宋代建筑诗的审美意蕴及雅俗趋向..... 吴邦江(185)
《京本通俗小说》(《中国集市传奇》)捷克文版前言..... 普实克 原著 李梅 译(192)
冯梦龙剧学实践的构建及其意义..... 王小岩(202)
姚鼐融通诗学初探..... 谢海林(212)

学术综述

- 近30年清代宗宋派诗歌研究述评 李剑波(219)
从众语喧哗到理性反思
——“寻根”文学研究述评 田文兵 赵学勇(231)

Contents

Space Prod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Xie Na(1)
From Langue to Discourse; Context Research Emergence	Wu Hao(8)
The Analysis of Types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Han Moyong(15)
On Modern Experience of Anxiety as an Aesthetic Question	Shi Xiuyong(22)
The Cultural Cause of Liu Xie's Fenggu Concept Formation and Aesthetical Implication	Fan Lihong(31)
The Buddhist Source and Artistic Formation of "Water-Moon"	Zhang Yong(40)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Liu Zaihua(50)
The Cultural Stand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Yi Yu(61)
Find a New Way in the Merg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Exploratory Drama" in the New Era	Hu Xingliang(67)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asant-Worker Novels Creation by Grassroots	
..... Zhou Shuitao(77)	
A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and Lai He about their Enlightenment Thought	
—Focusing on their Local Novels	Chen Jiayang(85)
On Wen Yiduo's Poetics	
..... Liu Dianxiang(94)	
The Colloquial Revolution	
—On Qu Qiubai's Thought of Literature Popularization	Yang Hui(103)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Reconsidered	
..... Li Chengxi(112)	
Multiple Dimensions about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 Liu Xueming(120)	
The Rebirth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ce	
..... Sun Xiaoyan(129)	
Brief Study on Wang Zengqi's Novel in Early 1980s	
..... Pan Wenfeng(135)	
Disillusionment and Nihilism Revolted by Writing	
—On <i>Autobiography of Wang Meng</i>	Dong Zhiling(142)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Original Form of Eulogy	Yu Lin(149)
Innovative Idea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Metrical Poems	Gong Zupei(156)
Tang Zhongzong and the Changes of Court Po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Lu Huafeng(164)
The View on the Writing Grammar of <i>The Keys to Classical Chinese Prose</i> ——Study on the Literary Idea of <i>The Keys to Classical Chinese Prose</i>	Ye Wenju(175)
On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nd the Trends of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of Architectural Poetries from Song Dynasty	Wu Bangjiang(185)
<i>Chines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China Market Legends)</i> Czech Edition of Preface	Průšek original, Li Mei translation(192)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ue of Feng Menglong's Practice in Drama	Wang Xiaoyan(202)
Tentatively Exploration of Yao Nai's Integrative Poetics	Xie HaiLin(212)
Review of Qing Poems Canonizing Song Dgnasty in Recent 30 Years	Li Jianbo(219)
From Sound and Fury of Multi-Discourse to Rational Reflection ——A Review of th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ian Wenbing Zhao Xueyong(231)

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

谢 纳

空间转向在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促使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模式发生重大转换,形成并建立起空间化的理论思考方式。在其影响下,美学理论、社会理论、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由此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探寻文学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以此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整体性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一 空间的生存性、体验性与审美性

时间与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任何存在总是一定时空中的存在,生命只有在时空中才得以生成与展开。虽然,“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命题,经由海德格尔提出而影响深广,但对“存在与空间”的存在论追问,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存在与时间”是人类所执著追向的生存论问题;“存在与空间”同样是人类所置身其中的生存论问题。从生存论视域看,空间总是生存性的,人总是空间性的存在者。这一界定引导我们从“存在与空间”的关系出发,探究人之存在的生存论根基,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将人理解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者,以揭示空间的生存存在论意蕴。

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空间的生存性”?显然,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将空间问题提升到生存论美学的层面予以思考。生存论美学将空间理解为生存性的存在,强调从人之存在的视域或立场出发,看待人与空间的关系,认为理解空间存在应该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强调人的生命存在、生活存在对于空间存在的优先性、意义性及本源性。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躯体、一片土地、一个家、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所以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之中,为空间奋斗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1]。正如蒂里希所言,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居有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6JC75011-44009】、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07BZW011】成果。

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空间的奋斗、空间的生产、空间的拥有、空间的体验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因此,从“存在与空间”的视域看,空间总是生存性的空间,空间总是人之存在的空间,是具有生存论意义与价值的属人的空间。人既是空间存在的规定者,又是空间存在的界限,空间因此具有了生存论的意蕴。正是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空间的生存论意蕴才得以显现。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明确提出“人是空间性存在者”的命题。在索亚看来,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人存在于空间之中,因为“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2],所以,空间的生产者是理解空间性存在的前提。空间不仅是人之存在的舞台背景,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首先应被理解为空间的生产者,而构成空间生产出发点的正是人的身体。“生产的空间性过程,开始于身体……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3]作为空间主体的身体规定着空间,空间因而成为人类主体建构的基地。空间主体性与主体空间性的生存论意义由此互动生成。人在生产、塑造社会空间环境的同时,社会空间环境也生产、塑造着人。“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辩证互动生成空间生存论意蕴。

空间的生存性特征,决定着空间的体验性与审美性。空间体验,即人在生存空间中感受、经验、体悟到的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空间体验决定着人的生存体验方式,同时也规定着文学艺术的生存美学体验。空间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意识,对文学理念及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在原始社会,幻想空间构成文化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时,人的实践改造能力低下,自然对人来说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人类只能依靠神话的幻想来解释世界,从而在文化中创造神话的幻想空间。幻想空间的文学创作,表达了人类试图征服空间、改造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农耕时代,土地空间的人工开拓和种植,使人类可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安居乐业,宁静的大地与乡村成为人最主要的空间生存形式,对自然空间的感受、认识和驾驭,成为文化空间的重要内容。前现代的古典空间意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观念之上,古典作家在有限的、宁静的、非流动的自然空间场域中生存活动,他们的空间观念与自然大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有浓厚的自然乡土气息。以自然空间体验为基础,人类建构起“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学理念及“情景合一”的文化诗学。因此,以山水田园诗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在古典时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人类的空间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延拓展。人类凭借工业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自然空间作为被主体征服的对象,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主体力量的增强确立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成了空间主体化的主体空间体验形式。在空间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文学关注的最主要内容,文学的叙事样态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城市化空间带给人新型的都市生存经验,由此形成全球空间、都市空间、政治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诸多现代性空间意识,这些空间意识渗入浸润着作家的主体审美经验及文学创作理念,使文学获得一种现代的书写视角及多样的艺术形式。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化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后工业信息时代的空间技术化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媒

介化,媒介空间、虚拟空间成为人类感知空间的基本形式,表征着后现代空间意识的曲变、延异和内爆。媒介空间的生存形式打破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的界限,文学的空间形式演化嬗变为虚拟变形的后现代景观。

二 表征空间与文化表征实践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三位一体。他认为,正是由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才得以建构。因此,在空间的三个维度中,“表征”无疑成为理解、界定空间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空间实践”侧重感性经验的物质性空间生产,而“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社会实践空间所凝聚积淀的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是一种侧重象征想象的精神性空间;那么,“表征空间”则侧重于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合一,这种合一构成人类生存其中的体验性空间。

理解“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首先要厘清“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核心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将表征理解为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意指实践。所谓表征是指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这一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称之为“表征的实践”。霍尔在指认表征的实践即“指把各种概念、观念、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4]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正是我们对一堆砖和灰浆的使用,才使之成为一所‘房屋’;正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思考和谈论,才使‘房屋’变成了‘家’。”^[5]霍尔强调“表征”的文化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实践或意指实践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产品都具有“表征”性。因此,任何物质生产过程都是意义表征建构的过程。例如,家园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在其物质生产过程中,包含着人类对“家园”的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所以家园是一个具有意义价值的文化空间,它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即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空间。

从生产实践论的角度看,“表征实践”既存在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中,又存在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表征实践”构成人类空间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人类空间生产实践大致可分为物质空间的生产与文化空间的生产。物质空间生产主要指,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以物质实体化为手段,对空间进行加工、生产、型塑、组织,改造空间的存在形式,进而创造出新的空间形态。显然,物质空间生产所创造的空间是属人的“人化的自然”,因而是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空间,但空间的存在形态依然表现为物质实体性。例如,城市空间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人化的空间”或“文化的空间”,但物质实体性依然是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与之相对,文化空间生产虽然也需要物质媒介实体,需要物质化和媒介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但其主要特征在于精神符号性,是一种想象、虚构、表意、象征、表征的符号化空间。文化空间的生产主要是指人类以精神符号为介质,通过精神生产实践,对空间进行再叙事、再想象、再隐喻、再塑造,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文化内涵,进而创造出符号

化的文化表征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空间生产成为表征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探寻“表征”与“空间”的关系,既是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建构文学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列斐伏尔对“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概念界定,为深入理解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实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表征涉及概念化的空间……它在任何社会或任何生产方式中都是主导性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6]因此,所谓具有表征性的空间就是一种象征想象的空间,一种体验的空间,一种符号化的空间。总之,表征空间既是充满着象征的符号化空间,同时也是充满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充满着相互纠结着的真实与想象的内容,充满着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充满着具体的空间实践活动的空间。^[7]

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式反映,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空间生产的表征性建构,是一个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促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产生不同的空间象征意义。例如,新中国利用十年时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重建,其作为封建王朝建筑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中国的民族象征,其使用功能及象征意义均发生重大转换。文学在这一空间意义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运用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段,重建了空间的表征性,赋予天安门广场以现代性的文化内涵。其中,郭沫若的《颂北京》一诗从天安门城楼建筑的雄伟气势入手,在抚今追昔中引入革命历史和国家荣耀。“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雄雄纠纠,磅礴礴礴;轰轰烈烈,炜炜煌煌。国风浩浩,文采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屹立,极建中央。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闪烁,万丈光芒。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全民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8]作为文学空间表征,郭沫若的诗并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简单描摹、场景再现,它在展示举国腾骧、红旗灿烂的盛况中赋予天安门广场以全新的符号意义,对于重新建构天安门的空间象征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在空间的意义发生和转换过程中,文学空间表征是赋予空间以意义或生产空间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symbol)、想象(imagination)、意指(signification)、隐喻(metaphor)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文学所参与的表征性空间建构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运用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的符号化的表征空间。社会空间的文化内涵,正是文学艺术活动所赋予的,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因此,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后者也一直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但因受制于客体主义空间环境决定论,其研究侧重描述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象景观等,由此导致文

学与空间的研究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学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荷花淀派等文学流派的分析,均侧重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忽视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乃至上述文学流派的命名方式都直接源于空间地缘的简单界划,缺少表征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探究。因此,从文学空间理论视域出发,对上述文学流派予以空间性思考,分析其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才能以此为基础,真正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整体性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三 文化表征空间与文学表征实践

文学表征实践在文化表征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是赋予空间以意义、建构空间表征性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学表征空间作为文化表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运用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在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的同时,所生产出的符号化空间。当我们说空间具有文化表征意义时,表明空间不再是孤立冰冷的客体,而是蕴含着特定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的文化空间。然而,人们以怎样的方式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文化意义?或者说,人们以何种媒介为载体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文化意义系统?从文化意义的层面看,语言无疑是赋予或生产空间表征意义的最重要媒介。因此,把握文化表征空间概念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语言、意义与表征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是把握理解文学表征空间概念的关键所在。

文学表征空间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生产建构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化空间。语言作为生成意义的工具或媒介,是一种具有意指性的文化意义系统,是一种具有表征性的文化实践系统。语言在赋予文化以意义的同时,也赋予空间以文化的意义,并由此建构起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公共空间场所的命名,即是语言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城市公园的建立始于租界公园。租界公园作为殖民主义的空间场所,成为歧视中国人的空间象征符号,铭刻着民族国家的耻辱。然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各大城市纷纷兴建起具有纪念意义的主题公园。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公园,被重新灌注以民族振兴的文化意义,成为教育引导民众、激发民族精神的表征性政治空间。在这场民族化、政治化的空间意义生产过程中,以孙中山命名的公园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城市,仅民国时期建成的中山公园就达249座。抗战胜利后,沈阳的千代田公园、长春儿玉公园、苏州公园、台湾台中公园等也纷纷改名为“中山公园”。作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公园因“中山”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具有了明确的民族主义内涵,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话语的表征空间。“显然,中山公园不仅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也是民族主义集会、举行仪式的活动场所,民族主义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因此,中山公园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9]上述分析表明,语言命名在生产空间表征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表征的意义上,审视文学在多维视域中所呈现的地域形貌、社会环境、城市场景、物象景观等多重叠加的空间场域,可见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再现反映。文学表

征着空间、生产着空间,文学直接参与了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文性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的内涵。长期以来,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缺少从文化表征实践的意义上审视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自觉,文学与空间被理解为一种线性决定的关系,其解读的重心放在文学与环境的客观再现与分类划分上,忽视了文学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内在隐秘之处,空间表征实践的真实内容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解读空间表征实践的意义在于,探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文学是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并拆穿揭破空间生产背后所隐匿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理性规训等社会历史动机,以及它对人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文化方式、生存方式及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空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作为社会空间的文化表征,文学的空间生产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社会政治权力角逐的场域。正如知识、文化背后隐匿着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关系一样,社会空间生产与权力运作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共谋关系。“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10]因此,勘察文化表征实践的空间生产过程,首先需要空间政治学批判的介入。空间政治学批判,致力于审视与解构空间背后所隐匿的社会权力关系,打开空间的隐秘处所,拆穿揭破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隐秘关系。正如福柯在《空间、知识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11]空间在现代权力规训中占据着重要和关键的位置,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正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得以具体操作和实施。为此,福柯特别申明,一部空间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文学空间表征实践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权力运作实施的历史。

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因此,无论运用表现还是再现的方式,文学运用文化表征实践方式所生产的空间总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表征性空间。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化艺术发展的三个要素,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及文学艺术风格;环境制约着人,环境决定着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要实证性地考察人及其精神文化的特征,就必须勘察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因此,空间环境描写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前提背景。受泰纳的影响,19世纪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均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在环境描写中展现环境与人物的复杂关系,探究人性构成的动因。如果说自然主义侧重于探求自然环境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现实主义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决定性影响。现实主义创作致力于社会环境的描写,追求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着力探寻典型环境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动因,并试图通过社会环境的典型描写来揭示现代社会人性形成的复杂构成。为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创作称为“生活场景”系列,地理空间、生活场景不仅是《人间喜剧》得以展开的背景,更是人性生成的土壤根基。与之相应,左拉在自然主义小说创作中,也十分重视环境描写,他提出“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处于他所生长和生活的土壤的种种影响之下,这就是何以某种气候、某个国家、某个界限、某种生活条件,往往都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2]。左拉效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社会环境进行了生理学的解剖分析,构思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长篇小说,全面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环

境和生活场景,将人性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强调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使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描写进入文本书写的范畴,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文学表征的社会历史空间。

显然,文学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性之间关系的关注重视,与资本主义空间重组重构所产生的激变动荡,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其中,文学空间表征实践渗透着人们对社会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的理解。由此可见,现代小说对空间环境的特殊专注,是以城市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空间重组的产物。列斐伏尔曾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13]。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自然带来空间的改变。随着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展开,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都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之一。现代都市带给人一种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偶然、短暂、流变和分裂的现代生活。现代人在对都市景观的沉迷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都市空间经验的感觉化、片段化、复杂化消解了传统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及话语语言说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学和艺术生产自然无可挽回地陷入表达危机的窘境。一种与都市空间体验和都市生活相契合的新型叙事方式的出现成为都市文学的内在诉求。因此,沉迷于景观,还是批判地审视景观,成为都市文学置身“景观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主题。疆域、国家、乡土、家园、都市、工厂、广场、景观、身体等空间场景或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的高频率出现,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所建构的空间意义加以不断地叙述或表征,从文本内部强化了现代性空间重组与生产的意义。文学所参与建构的民族国家空间、政治权力空间、城市景观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身体空间等,显示出空间生产同现代社会的生产一样,是一种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表征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是渗透着政治文化权力的场域,它无所不在地操控规训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总之,透过空间来重新思考文学艺术创作,可以使我们对其艺术审美的内在文化动因,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理解和把握。

注释

- [1] 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19—1120页。
- [2][3] 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 [4][5] 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3页。
- [6][13]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 pp. 38—39, p. 31.
- [7] 索亚:《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
- [8] 郭沫若:《潮汐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8页。
- [9] 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见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 [10] 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 [11] 夏铸九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1998年版,第221页。
- [12]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从语言到话语：语境研究的兴起^{*}

吴昊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语境”研究。这些领域包括普通语言学、哲学、解释学、修辞学、文体学，也包括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众多艺术研究领域，甚至连自然科学也出现了一种语境研究方法。“语境”研究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兴起，其最终还要追溯于20世纪初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这个转向，我们已经无数次谈起，但对于由它而兴起的“语境”研究，我们却鲜为谈及。

语境在语言学转向的最初是备受排斥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注意力都转向了“语言”，而将“言语”相排斥。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一种共时性的具有深层结构和规律的体系；而言语是个人的暂时行为，是一种历时性的复杂多变、无规律可循的语言运用现象。在“语言/言语”这对范畴中，“语境”是与后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最初，“语境”连同“言语”一起被弃置在视野之外。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充分发展，其隐藏的巨大弊端日益显现，直到语言学转向发展到顶峰——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之后，其自身便发生了从“语言”到“话语”(或“言语”，见注释[1])^[1]的内部转向。

这种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鲜明地呈现于普通语言学、语言哲学、解释学、修辞学、文体学和文学研究等众多学科领域。伴随着“话语”研究的兴起，“语境”研究也在众多学科领域中蔚然成风。语境研究从普通语言学源起，经过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发展，泛化应用到修辞学、文体学、文学研究等众多领域，业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一 语境研究的源起：普通语言学

自索绪尔以来，普通语言学一直以抽象、系统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共时性的语言学研究。但这种研究排斥日常生活的鲜活语言，日益显露出它的封闭狭隘。所以语言学界开始重新将“言语”^[2]纳入视野，而这正是“语境”研究兴起的契机。

“语境”这一概念在语言学中由来已久，但语境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莫衷一是。然而大家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些观点：语境是言语交际中使用语言的环境，对于语义的理解、交际的正常进行必不可少，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交际者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

* 本文获得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文学语境研究”，编号2009A785。

境、心情等主客观因素都属于它的范围。

但这样理解语境似乎不尽然，因为语境在语言学中前后相继地表现出四种形态：语篇的上下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可以说每种形态都具有一种内涵。如果把四种含义叠加起来定义语境，似乎还是不妥当，正如德里达所说，语境自身无边无际，每一种给定的定义都会被新的语境突破。所以这里只能将语言学中出现过的语境思想呈现出来，以期获得对语境的基本印象。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研究土著语言的过程中，发现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语言必须依靠当时语言使用的环境，因而开始着重研究语境，分别于1923年、1935年提出了“情境的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的上下文”(context of culture)两个概念。^[3]在此之前，语境概念已经作为“上下文”的含义而存在，其英文“context”的原意即为上下文。马林诺夫斯基的提法从语义学和人类文化学的双重意义上拓展了语境概念。

他的学生弗斯(John Rupert Firth)将“语境”的含义从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上下文”进一步引申为“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弗斯关注的是语境的交际功能，将语境划分为言语交际参与者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有关事物及事件、言语行为的效果等诸多要素。弗斯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对以后的语境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但他偏重情景语境，忽略对文化语境的研究，此后语言学界一直保持着这种重情景语境轻文化语境的倾向。

同样受弗斯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M. A. K. Halliday)也十分重视情景语境，但他用的是“语域”概念。他将“语域”划分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每一部分的变化，都会产生新的“语域”。时至今日，在情景语境因素的分类中，他的三分法影响依然最大。韩礼德还阐明了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的互补关系。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实例，而文化语境是情景语境的抽象系统。两种语境实则同一种现象，差别只在于近距离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情景语境，远距离看到的则是总体的文化语境。这种阐明有一定道理，但仍是对于文化语境研究的虚化。

其他还有海姆斯(D. Hymes)、范戴克(van Dijk)、张志公、王德春等很多语言学家论述过语境，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上这些语言学家所进行的语境研究实则只是语言学中语境研究的一条线索，即对情景语境的研究。近些年来语境研究又出现了另一条线索，即对认知语境的研究。认知语境研究热潮的发起者为认知语用学家丹·斯伯伯(Dan Sperber)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他们的关联理论对语言学影响巨大。关于认知语境，我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

由此可见，语境研究在语言学中由来已久，而且至今方兴未艾。在1989年王德春就提出了建设语境学的构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努力建设这门新学科。从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语境学的建立势在必行。语用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乃至电子计算机语言学等新兴的边缘学科无一不与语境有着重要的联系，如功能语言学的“语域”、语义学的“语义场”、语法学的“语法场”等都是“语境”在各个具体学科中的应用。^[4]同时这些边缘性语言学科的建立也在显现着这样一种趋势：语境在从语言学逐渐向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延伸和渗透。